

诗词中的宁夏(之一百一十四)

贺兰山石砚

张嵩

贺兰山石砚是宁夏的特产之一,用来制砚的贺兰石产于贺兰山滚钟口一带,是岁月经过数亿年的积淀而形成的自然“精灵”。贺兰石质地细密均匀,清雅温润,分为绿紫两色,紫里含绿,绿中衔紫,纹理交错,天然玉成,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石料。用其雕刻而成的贺兰砚,滑不灰墨,涩不滞笔,加盖后墨在砚中数日不干不臭,具有发墨、存墨、护毫、耐用等优点。据清《乾隆宁夏府志》卷三“山川篇”中“宁夏宁夏县”一节记载“笔架山,在贺兰山小滚钟口,三峰矗立,宛如笔架,下出紫石可为砚,俗呼贺兰端。”贺兰石分为前山石和后山石两种,此处记载的是前山石。清末湖南宁乡人谢威风担任宁夏知府时,由于他喜书画,尤爱贺兰山石砚,便差人通过仔细勘察,采集矿样,确认后山大寺沟的山峰背面石质比前山石更细腻滑润,彩色石也较多,故此处开采出的砚石就是后山石,也是现在制砚所用的原材料。数百年来,贺兰石的开采及其雕刻制作的砚台名贵天下,历来为文人墨客们所喜爱,因之也对贺兰山石砚的赞美不绝于耳。清乾隆年间著名文学家刘大槐就写有一首《贺兰山石砚歌次韵》的古风:

伟哉贺兰山上石,自入中华声赫奕。肌容青玄毓地精,骨理细腻含天泽。琢就常为染翰珍,重之不减连城璧。洗向云溪欲欲净,润通月窟星堪摘。饼金镇日贡山簏,鼓玉连年输海舶。岂如兹石价无双,采自遐荒影冷只。研磨人无手指痕,凹凸岁有松煤积。求洁滌滌已出棧,待聘殷勤犹在席。宜图其大所直寻,纵展所长不盈尺。浮生贵贱有何常,付与人言任烦曷。

刘大槐(1698—1779年或1780年),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今安徽省枞阳县汤沟镇陈家洲人)。清代中期的古文家、诗人,“桐城派”代表作家。著有《海峰先生文集》《海峰先生诗集》《论文偶记》

▼位于银川市西夏陵三号陵。



1 王朝缩影

20世纪30年代,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行员卡斯特尔飞越宁夏贺兰山时,用随身携带的相机“定格”下山脚下片奇怪的建筑——圆锥形的“土堆”,并收录进其《中国飞行》一书。这些“土堆”是什么?“土堆”下又埋藏着什么秘密?约40年后,宁夏考古人员钟侃和同事在凛冽寒风中初次走近这些“土堆”时,心中疑惑恰如卡斯特尔。年轻的考古者捡回一些刻有神秘文字的残碑,便一头钻进浩瀚史料中。他们翻遍史书,终于发现蛛丝马迹。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贺兰之东,数家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神秘土冢,很可能与西夏帝陵有关。残碑上的神秘文字,亦被考证为西夏文字。

据史书记载,李元昊立国前夕,授命大臣野利仁荣以党项语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度变成无人能解的“天书”。带着这些“土堆”可能就是西夏帝王陵墓的期待,1972年,宁夏文物部门正式对这片区域开展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根据陵墓规模和独特的月城结构,从数百座陵墓中辨认出史书中有明显陵号记载的9座帝陵。然而,这9座帝陵分别归属哪位帝王却迟迟没有定论。和钟侃一起踏入这片神秘陵园的,还有来自北京的学者李范文。在李范文眼中,西夏文字是打开西夏历史与文化的钥匙。为此,他毅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西夏故地宁夏工作。6年里,李范文对3270块西夏残碑逐一考释,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碎编》和《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出近6000个西夏文字,最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夏汉字典》,成为继西夏学开拓者王静如之后第二位捧回法国儒莲奖奖杯的西夏学学者。李范文解密西夏文字的执着,为西夏陵考古发掘工作带来突破性进展。

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从中成功拼合出一块西夏文碑额,并考释出碑额上16个西夏文篆书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由此,七号陵被确定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确定主人的陵墓。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夏陵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者基本廓清西夏陵总体布局、遗存构成等信息。根据目前已知的各陪葬墓规模、形制,考古专家将西夏陵陪葬墓分为三个等级,绝大部分尚未进行过考古发掘。已经发掘过的3座陪葬墓,主要出土有反映西夏随葬制度的铜、铁、铁制的动物形器、武器、瓷器、动物骨架,以及丝织品、钱币、饰物、食物等随葬品。结合多次入葬痕迹,考古人员判断该墓为一夫多妻的合葬墓,为党项族一夫多妻婚配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这个造型生动逼真、工艺高超的“国宝级”文物如今“镇守”于宁夏博物馆,成为人们了解西夏青铜铸造工艺及农耕文明的重要窗口。

赵惟熙的五绝诗《砚山斋》:

贺兰富研材,堆砌成小山。夙有临池意,簿书饶余闲。

赵惟熙(1859—1917年),字芝珊,江西省南丰县人。工于书画,气格旷达。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宁夏知府,后任甘肃省巡警道,代理甘肃布政使;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署甘肃省都督兼民政长,主持甘肃军政;民国三年(1914年)三月为参议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赵惟熙的这首诗自述在自己书斋“砚山斋”里作诗临字,由眼前的砚台联想到贺兰山富有“研材”(研材即贺兰石,是制作砚台的原材料);而自己的书斋里贺兰石堆积成了一座小山;用这些石头雕刻制作的砚台使临池学书的意兴大增,所写的贴本也一天天薄了,就这样洒脱不俗地度过了许多公干之余的时光。从诗中可见作者是一个酷爱贺兰石砚台的书法爱好者,当然以知府的身份拥有“小山”一样多的贺兰砚石料,对主政一方的封建时代官员来说是很正常的,赵惟熙也是“慧眼识珠”,还饶有兴致地专门作了一首五言短诗来记录自己平时的爱好,对贺兰山石砚也算起到了宣传作用。赞誉贺兰山石砚的诗作以清代居多,酬赠唱和及抒写个人

另外《民国朔方道志》卷二十九“艺文志·赋诗”中载有一首

神秘西夏陵的特殊见证

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个王朝如流星般闪过,短暂却璀璨。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与宋、辽、金等王朝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曾控制河西走廊。然而,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攻灭后,因史料匮乏、文字阻隔,西夏逐渐销声匿迹,从此扑朔迷离。走进西夏陵,是一次探寻历史之旅,更是一次感悟文明之旅。党项族、汉族、回鹘族与吐蕃族等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共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西夏陵;而其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亦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特殊见证。

作为西夏陵考古发掘“第一人”,钟侃曾说过,在中国历史上,西夏陵是地面遗迹保存得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是研究和了解西夏史信息量最大的一处历史文化遗迹。寒冬时节,慕名而来西夏陵参观的游客依然不少。暖阳下,在被推测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泰陵的三号陵陵塔前,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不厌其烦地向游人解惑——西夏陵为什么“不长草,不落鸟”?“陵塔是西夏陵园中最高大的建筑体,刚被建造出来的时候,是七层高的实心八角密檐塔。如今,经过千年风雨,陵塔外的木结构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高大的夯土建筑供世人瞻仰。”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说。夯筑技术是我国自新石器时代沿用至今的主要建筑技术之一。西夏陵陵塔以黄土混合砾石夯筑而成,夯层清楚、密实,硬度强,显示了西夏对这一技术的熟练掌握应用。师培轶解释说,三号陵陵塔夯土

瓷实,经过分析还加入了白石灰,加之北方雨水少,植物难有存活空间。西夏陵令人惊叹的地方还有很多。细阅西夏陵各时期考古报告可以看出,“仿巩县宋陵而作”的西夏陵大量吸收借鉴了中原王朝的陵寝制度。在帝陵布局上,西夏陵沿袭唐宋帝陵主要构成要素,加以改造和添配:保存了包括陵门、角阙、献殿、陵塔在内的陵城,陵城外神道、阙台等构成要素,以及神道—陵城的轴线对称布局特征;取消了北宋帝陵中的成对乳台,替之以碑亭,并将碑亭制度化于每座帝陵和部分高等级陪葬墓中。西夏陵的建筑装饰构件同样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宁夏博物馆,刻有汉文、西夏文的“国宝级”文物“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引人注目。据了解,西夏陵共出土了十余件类似的人像石碑座,整体近似一个正方体,正面看是一个大力士,其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眉眉上

翘,双眼圆睁而外突。不同于中原传统高等级石碑下的龟趺,这些人像石碑座兼有突厥石人、佛教力士和汉族碑座的风格。六号陵出土的鸱吻,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古代琉璃鸱吻构件之一,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证实了琉璃烧造工艺在西夏的传播与发扬。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迦陵频伽乐伎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为人面鸟身,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在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看来,西夏陵及其出土文物作为实物例证,生动地展示出西夏从建筑、文字到政治体制、农业生产技术等各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恰是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宁夏大学民族与



演员在西安长安十二时辰景区表演《霓裳羽衣舞》(5月19日摄)。

西安,一座拥有3100多年建城史,11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周礼秦制、汉风唐韵,留下的文化瑰宝灿若星河。近年来,通过聚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建设更新、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方式,古都西安在对丰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辉煌历史与活力今朝已然融汇成发展的澎湃动力。

新华社发



琉璃鸱吻复制品。

历史学院副院长彭向前长期考证西夏服饰“吊敦背”、西夏乐器“马尾胡琴”、西夏兵器“神臂弓”的发明及传播过程。其中,“神臂弓”是西夏人在“弩”的基础上创制的,后向东传入北宋,历宋元明清诸朝,在战场上风行数百年之久,在中国古代兵器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影响,从而守护这片历史遗迹,延续其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夯土建筑保护是世界性难题,本着最小干预原则,直到2000年国内技术相对成熟时,我们才与敦煌研究院开展合作,从本体加固和提高夯土表面抗风化能力两方面入手,探索适宜西夏陵的保护方法。”西夏陵管理处文物保护科科长任秀芬说。记者采访了解到,自2000年至今,在中央和地方的支持下,西夏陵先后对九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自2015年后,西夏陵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引进了遗址动态信息及监测预警系统,借助科技力量提高遗址保护精细化水平和预防性保护能力。“从宏观层面,我们会监测每一年度降雨量、不同陵塔的降雨量、什么时候降雨等信息;从微观角度,则通过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高度的探头,去监测每一次降雨对土遗址含水量、电导率等造成多大影响。这些数据会被收集起来进行分析,以指导后期的预防和加固保护工程。”任秀芬说,他们每年还会组织技术人员对遗址进行全面“体检”,及时解决遗址出现的小问题。周边环境整治也是遗址保护的重要内容。从2009年到2015年,西夏陵陆续实施多项环境整治项目,



游客在西夏陵博物馆通过智慧化展柜了解迦陵频伽(2024年11月26日报)。

在西夏陵遗址区,不时能看到竖立在一处处遗迹前的米黄色石碑,碑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夏陵”13个黑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自13世纪西夏灭亡后遭毁灭以来,西夏陵默默承受着风雨侵蚀及各种病害,一些陵塔甚至存在倒塌风险。为更好地保护这处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

整的考古遗存,国务院于1988年将其确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此,西夏陵获得最高等级保护。30多年来,西夏陵保护管理机构对遗址进行常态化维护,并针对主要干扰因素对其实施专项保护措施,控制并显著降低了人为破坏和自然侵蚀对西夏陵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

包括建成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封闭围护陵区和各帝陵陵园,并派专人日常巡查;搬迁陵区内生产生活设施,修复生态环境;建设现代防洪工程,维护古代防洪工程遗址等。贺兰山多山洪,西夏陵在贺兰山下矗立近千年,从未遭山洪毁灭,离不开王陵建造者所修筑的防洪工程。西夏陵的文物保护条件也在不断提升。师培轶清晰记得,1996年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成立时,文物库房就是一间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存放的文物只有从遗址区收拣而来的残砖断瓦。2019年,新西夏陵博物馆投入使用。“我们也有了规范的文物库房,还添置了恒温恒湿储藏设施,能更好地为馆藏有机质文物提供保护。”师培轶说。展陈手段的迭代升级和互动项目的不断完善,也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在西夏陵博物馆,三维扫描技术、VR成像技术、智慧化展柜等展陈手段,让游客能通过触摸玻璃展柜与文物“亲密互动”;在遗址区,精准的文字说明与“复原”展示的建筑构件,带游客遥想陵园昔日的辉煌壮丽;木活字印刷西夏文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死去”的西夏文字活起来;书签、冰箱贴、西夏瓷等600余种文创产品,让西夏文化的余韵更加悠长。

(据新华社)